

第一章

杨森提挈后辈

1932年，杜重石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后，凭他父亲与杨森的深厚世谊，被杨森任命为二十军军部秘书。从此，这个本来学艺术的学生，进入了军政圈子，在坎坷的道路上艰难地颠簸了一生。

一、讲闲话引出话头

四川古为巴蜀之地，川东为巴国，川西为蜀国。据《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9日的考古发掘报道，早在20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的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所以这里也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

四川省是我国各行省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行省，现有人口1亿1千万，将近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解放前，现在的四川省分为四川和西康两个省。整个西南地区共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个省。当时西南地区川、康、云、贵四省一共7000万人口，四川就占了5000万。半个世纪来，我国总人口翻了一番，四川省的人口相应地也翻了一番。

四川不但在西南四省中人口最多，物产也最丰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但是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实只富了一个“川西

坝子”，而川东和川北的山区则十分贫穷，老百姓连穿衣、吃饭都有困难。

1949年11月，笔者是二野三兵团进军大西南接管部队的成员，路经川东秀山、酉阳二县的交界处，当时天降大雪，命令就地宿营。我们一个班在公路边不远的半山坡上找到一家老乡，就在那里住下。进门不久，就发现这家人家夫妻两口子只有一条能遮羞的裤子，需要见人或外出的时候，两口子倒换着穿；一个五六岁的小儿子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大门口看雪；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因为既没有衣裳也没有裤子，只好躲在床上不露面，后来见她像猫似的溜下床来上厕所，才发现她身上也是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再看看他们的床上，除了茅草之外，根本就没有被褥。问问孩子，只知道吃苞谷，根本不知道大米饭是什么东西。于是全班同志纷纷解开背包，拿出不多的替换衣裳来“武装”了这一家四口。“解衣衣人，推食食人”之余，得知这家人家已经四个多月没尝到盐味儿了，于是我们又把随身带着的食盐给了他们小半碗。两口子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几乎给我们下跪。

第二天出发，一路上经村过庄，所见到的大人孩子包括姑娘、媳妇儿在内，身上挂的全是“烂巾巾”，也就是无法再补的破布片。于是大家再次解开背包，许多人自己也只剩下身上的一套军装了。

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贫穷的百姓，而且是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公路边儿不远处。同是一个四川，贫富悬殊竟有如此之大！后来我把自己的亲眼所见讲给许多人听，居然还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

广安县，在四川省东部，距离成都约200公里。清代以前属顺庆府管辖。辛亥革命后废顺庆府，改名南充。现属南充地区管辖。这里地处山区与盘地的缓冲地带，没有太高的山，也没有广阔的平原，县境内以丘陵为主，连县城也建在半山坡上。有一条

渠江，从东北往西南流经全境，到合江与嘉陵江汇合，注入长江入海。物产和生活尽管比不上川西，但比山区还是富庶一些。

据清代《广安县志》记载：“广安厥土饶沃 无旷土 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富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鲢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苞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饭；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襁布，汉赋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本地人为本县修县志，不免要自夸几句，实际上广安的天时地利，都不如县志上写得这样好。

处于丘陵地带的广安县，山坡一般都比较平缓。即便是石山，也很少有突兀而起的崇山峻岭。山虽然大都是土山，可惜土质较薄，不利于草木庄稼生长。但是每个山顶，几乎都有一棵黄桷树孑然独立，树干挺拔，枝叶茂盛，树冠伸张，远看幢幢如华盖。怪的是，每个山顶，总是只有一棵黄桷树，很少有两棵并排的。因此“识者”有曰：广安县要出几个大人物，不过他们只能各立山头，独霸一方，互不相关，互不统属云云。

这话也许不错，因为广安县确实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著名的地方军阀杨森，就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广安县人。第一，他的小老婆之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至少在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中，恐怕是数一数二的了；他几乎到处都有公馆，每个公馆里都有个小老婆。老婆多，自然子女也多。子女吃饭前，要做祷告。但不是向上帝祷告，而是同声念出：“爸爸给我衣穿，给我饭吃……”第

襁——指襁城。川东古为巴国，有襁族人在今广安地区筑襁城。公元前 316 年，巴国为秦所灭，改襁城为宕渠县，属巴郡；五代改名始安；隋复襁城旧名；唐改名渠江；宋改名广安，以迄现今。

二，他与共产党的关系，说不清也道不明。1920年，恽代英与萧楚女在泸州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不但支持，而且还常常参加活动，似乎颇有进步倾向；北伐期间，他当二十军军长，共产党员朱德，是他的党代表；他儿子杨汉忻、侄女儿杨汉秀，又都是正牌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杨汉秀，还是延安派到重庆去做策反工作的，四川解放前夕，让军统局特务杀害了；他自己本人，在四川当军阀，与各川军军阀争地盘，到上海抗战，几乎全军覆没，当过贵州省省主席，也当过重庆市市长，后来到了台湾，活到96岁，不但在90岁高龄还娶了个17岁的小姑娘做第13房姨太太，居然还给他生了第43个孩子，开创了夫妻年龄悬殊、老年得子两项吉尼斯记录。此人一生，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不是四川军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广安县人杨森，而是另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广安县人杜重石。他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而且还是个袍哥大爷。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的现、当代史。

他——是杨森的秘书，是二十军驻上海、成都办事处的少将处长，是延安抗大的学生，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是贺龙的政治代表；

他——学的是艺术，干的是政治，当的是袍哥大爷，做的是党的统战工作；

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铁骨铮铮，虽九死而无悔，历史最终证明他无罪；

他——是一个特殊的少将，一个特殊的党员，一个特殊的袍哥，一个特殊的犯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特殊的道路上，忍受着特殊的委屈。

人人都知道，革命战争，有明暗两个战场。一个在地上，那里

炮火连天，硝烟遍地，军号一响，冲锋陷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肉搏战，争的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为每一寸土地付出血的代价，较量的是武力；一个在地下，这里听不见枪声，看不见炮火，凭的是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以语言作武器，用文字作刀枪，也许还要嘻嘻哈哈，频频碰杯，甚至出入歌厅舞榭，妓院娼寮，在与敌人“同流合污”中进行隐蔽的战争，较量的是智力。一个有勇有谋的斗士，往往愿意在明的战场上拼搏，争一个谁强谁弱，斗一个你死我活，是胜是负，心明眼亮，胜得痛快，败得心服，而不愿意在暗的战场上用一言一语、一计一谋去磨磨蹭蹭，去勾心斗角。其原因，就在于地下战场的战斗比地上战场更激烈、更复杂、更难于应付，对个人来说，更充满危险性。

但是，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两个战场，却又是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有时候，地下战场所取得的胜利，能胜过地上战场十万神兵的战果，甚至是地上战场所不能取得、不能替代的。因此，不管地下战场有多么困难、多么危险，还得有一部分革命战士而且是最优秀、最忠诚的战士舍命去做。

其实，不论地上战场还是地下战场，根本的目的，都是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力量。地下战场，如果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以取得敌方的情报为目的，一个以取得对方的理解为目的。第一个地下战场的斗士，不管他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都要求具有各种各样用于窃取情报的技巧，包括化装、跟踪、摄影、游泳、驾驶、打斗、密电、急救等等全套技能，以便在任何困难的处境下顺利取得情报，为地面战场服务；还需要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一旦暴露，要凭自己的本事“全身而退”。第二个地下战场的同志，是从思想、认识、利害关系等方面争取敌对营垒中的人脱离敌方与我联合，以分化、瓦解、削弱敌方的力量，或争取中间力量为我方所用。

在敌占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就属于第二个地下战场。

“统战工作”不但比地上战场的战斗难打，而且比地下战场的第一个战场处境更困难。其困难之处，不仅仅在于要遭受到敌方的袭击而牺牲，更有可能来自自己方的误会、中伤而惨遭磨难甚至杀害。

这部书中所写的杜重石，就是我党一个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而在解放后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前辈。他那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本书中，说的固然主要是他一个人的历史，但是通过他的故事，反映的则是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二、军部秘书兼一中校长

广安属于丘陵地带，即便是县治所在的广安县城，也不是一马平川，民居大都依山逐水而建，有高有低。

当年的广安县城内，有一条“正街”，又有一条“后街”。在正街与后街的交叉处，有石阶拾级而上，名为“州坡”。在州坡上面，有一所广厦，住着杜氏家族四世同堂的老少50余口。

杜家堪称当地望族。1913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九），杜重石即出生于这个殷实的富户人家，在兄弟中行二。

杜重石的父亲名奉圣，号述言，生于清光绪二年丙子（公元1876年），与邑人视学（相当于现在的县教委主任）王宣奕、翰林蒲殿俊（清解元，四川立宪派首领）同庚。三人过从甚密，互称“庚兄弟”。述言先生世居广安，忠厚传家，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在邑人眼中，是个正直的士绅，声望甚高。杜重石上小学的时候，广安县团练局邓局长曾邀请述言先生为其副职，但述言先生淡泊名利，婉言谢绝，并矢志终生隐德不仕。

按照杜氏族谱“奉先宜全……”的辈份儿，述言先生给大儿子起名叫先觉，字斯民，给这个“老二”起的族名叫“先器”，字

“重石”，后以字行。后来还有一个老三，名先谷，字文博。

当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人们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和标榜民主共和新政的“中华民国”都抱欢迎的态度与殷切的希望，纷纷把孩子送到本地新办的小学、中学去读书。但是当时已经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广安县，却只有一所初级中学。读完了初中，只能到顺庆府去读高中。稍有经济实力与政治远见的家长，干脆把孩子送到成都、重庆甚至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高等学府去深造，以便接受更多的新知识、新事物。

杜重石既然家道殷实，父辈又是开明士绅，也算书香门第，当然不会例外。他从小天资聪颖，16岁中学毕业以后，就到当时最“开化”的上海去读书——进的是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的是戏剧与绘画。

1932年暑假中，刚刚步入20岁的杜重石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广安，正好赶上八月十五“团圆节”，与家人团聚；也赶上了自己的“弱冠”大礼，向家人、亲友宣布自己已经成熟，可以出仕“替天行道”了。

他少年英俊，一表非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称得上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他家学渊源之外又加西方艺术的熏陶，更显得谈吐风雅，风采照人，学贯中西，才华横溢。他的学成归来，一时间竟使小小的广安县城人人瞩目，成为“风云人物”了。

大学毕业，应该献身于社会，学以致用了。但是干什么事情好呢？

他学的是艺术，长于戏剧和绘画，要让他自己选择职业，当然最好是搞艺术，以实现自己从小就梦寐以求的理想。不得已而退一步，不妨到中学里去当个老师，为国家培养一批有志于艺术的青少年，用戏剧和绘画去反映国家民族的苦难、人民的疾苦，从而唤起民众，振兴中华。可是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四川省经过一二十年的省内内战，至今仍陷于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是许

多急于要做的工作没人做，另一方面许多有才能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以至于像杜重石这样有为的青年，竟连这样一个极低的愿望和要求也实现不了。

当时“九一八”事变刚过去一年，东北三省已经沦于日寇之手。尽管爱国志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义愤填膺，但是各地封建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并不以国家安危、民族荣辱为念。对于一个学艺术的青年来说，要想通过戏剧与绘画来“艺术救国”岂不是痴人说梦？

为了给儿子寻求出路，杜老先生带着“学成回乡”的杜重石四处拜客。当时的广安，一切都在地方军阀二十军军长杨森的统治与控制之下，他不仅控制了军队和县政府各部门，就连工商界、教育界也都由他说了算。杜老先生在当地是知名士绅之一，他与杨森并非泛泛之交，而是世谊甚深。杨森从下川东败退川北，回到老家广安，头一个拜访的就是述言先生，可见交情非比一般。既然一切都要通过杨森安排，因此杜重石回到故乡以后，述言先生带他去拜访的第一位“父执”，就是杨森。

杜重石跟着父亲到了杨森的公馆。杨森的公馆很多，几乎各大城市都有。在汉口的叫“杨森花园”，在重庆的叫“渝舍”，在成都的叫“蓉庐”，但是在老家广安县城内，反而一直没有他自己修造的公馆。他原籍湖南衡州，祖辈迁居广安龙台寺，他在顺庆中学读四年级的时候，考取了清廷设在成都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从此离开家乡，先后在云南、四川各地带兵打仗，在混战中发展势力，争夺地盘，军马倥傯，很少回到老家来。直到1928年底在下川东战役中被刘湘战败，兵退川北渠县，又于1931年初占领广安、岳池、营山、蓬安、顺庆五县，把军部设在广安城里，决心把老家当作他东山再起的根据地，这才着手在广安建立公馆。

自从杨森在下川东战败之后，是他历史上最穷的时候。部队粮饷无着，靠东挪西凑和友军接济过日子。军官不论大小，每人

每月一律发两块八大洋。可见杨森当时经济上窘迫之一斑。

尽管杨森占领了广安等六县以后，增加了地方赋税和盐税的收入，但要他拿出十几万银元来盖一所新公馆，一时间还是办不到的。但是堂堂军长，总不能没所公馆。何况他妻妾成群，子女众多，总不能叫姨太太们也像士兵似的住集体宿舍、打通铺吧？

正好坐落在县城北沧沟街的一所王氏巨宅要出售，杨森以 2.8 万银元的价格买了下来，经过装修扩建，粉刷一新，倒也相当气派。

所谓的“北沧沟”其实是一条臭水沟。杨森的公馆既然坐落在这里，北沧沟也就得到了疏浚，河水清且涟漪，夹岸垂柳依依，风景之美，犹如公园一般了。

公馆落成以后，因广安昔称“賸城”，有人建议定名为“賸庐”，杨森未取，自己起名叫“涵虚山庄”，并亲笔写了，刻在汉白玉石上，镶在大门的上面。

杨森的“涵虚山庄”杜重石也还是第一次来。这座在广安全县来说堪称一流的公馆，却居然建在半山坡上，是顺着山势一进展从低到高修建的。整个建筑群，大门的地势最低，里面的房屋，一幢比一幢高，远远看去，重楼叠翠，非常雄伟。大门外面，左右各有一片栽着“铁线草”的青草地，植有法国梧桐，看样子是原房主的旧物。进了大门，迎面有四棵硕大的铁树，枝叶茂盛，非常壮观。这可是杨森花了重金从广东购得，再通过水路不远万里运回广安来的。——不知道是它们“水土不服”呢，还是年龄不到，据说到了广安以后，就从来没有开过花儿，一直到 1978 年，四株铁树方才同时全开花儿了。——沿着台阶拾级而上，进了二门，有几进院子，四周都是高大的瓦房，最前面的一进是杨森的书房和会客室，后面的几进是他的“后宫”。再往上走，则是杨森的“后花园”。这里虽然没有“四时不谢之花”，但是青石台阶的两旁，果木花草却也不少。山顶上还有一个“涵虚洞”，一般人轻

易不能进去，可能是他“静养”或者处理军机大事的地方。

杨森子女众多，自己也喜爱体育运动，翻修涵虚山庄的时候，居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愣在半山坡上开辟出一座儿童游乐场和一座不算小的网球场来。

杜老先生带着儿子，专程拜谒，杨森在书房盛情接待。

杨森虽然是广安人，但是极少回到故乡来，所以对杜重石这个下一辈的青年，其实并不认识。杜重石从小眉清目秀，聪明乖巧，很得大人的喜爱；在学校里读书，总是名列前茅，常得师长们的夸奖。如今大学毕业，已经是一个体魄强壮、思想成熟的青年了。经过“九一八”爱国救亡运动洗礼的大学生们，一提起抗日，都有滔滔不绝的一车子话好说。杜重石是个爱国青年，在上海参加过学生运动，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杨森见到这个英俊魁伟的大学生，经过一番谈话之后，就对杜重石十分赏识。

杨森本来就很重“乡谊”，凡是有广安人去投靠他，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录用。他的二十军，高级将领们不是他的子侄，就是他的学生；下级军官和士兵，则绝大多数是广安人。所以人称二十军为“杨家将，广安兵”。杜重石既然是广安人，又是老朋友的孩子，杨森自然要格外照应，何况他对这个器宇轩昂的年轻人还特别有好感呢！杨森是个在仕途上久经沧桑的宿将，见杜老先生今天特地携子来访，心里已经明白其来意，所以没等杜老先生提出请求，当时就主动表示要留杜重石在军部当秘书的意思。

对于这样的“恩遇”如果是别人，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是对杜重石来说，却还有些“意犹未尽”。他不是嫌秘书的官儿太小，而是不愿意投身在军阀部队中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封建纷争。他是广安人，虽然在上海读书，对杨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二十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多少也有些耳闻。从洁身自好出发，他并不愿意插足到这个是非的漩涡中去。今天之所以跟随父亲来看望这个“父执”，根本就没想到要“弃文就武、投笔从戎”，而是

因为杨森掌握了当地的军政大权，要想谋一个差使，非通过他不可。所以杨森一提出这样的“动议”，竟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他急忙表示：一者他没有从军的打算，二者他也不是当秘书的材料，只要求在哪个学校当个教师，即于愿已足。

杨森哈哈大笑：“要当老师 这还不容易 我早有志于在广安办学校了，军内军外，文的武的，我都想办。只是目前我刚刚安定下来，百废俱兴，一时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揽不了那么多的买卖。眼前第一个急着要办的，就是中学。这样吧，你先到我军部来挂一个秘书的衔儿，等我的学校办起来了，马上让你去当教师 这还不行吗？”

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作为晚辈，如果坚持说“不干”，未免太有点儿“不识好歹”了，何况他父亲还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撺掇怂恿，只好硬着头皮，暂时答应了下来，而把希望和出路，寄托在杨森开办的学校上，寄托在杨森的不食言上。

细想起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缘份”二字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各方面都很不错的人，在某些人看起来，偏偏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能挑出一大堆毛病来，怎么也说不是一块儿去；而一个缺点很多的人，凑巧在某一个问题上有与众不同的见地，得到了某人的赏识，于是“一美遮百丑”，于是越说越投缘，于是就有了缘份，于是……于是一切都好说了。

杜重石之与杨森，就有这样的缘份。尽管在部队里当秘书，与他的所学相去甚远，他也无意于从军，但在那个时代，艺术不但救不了国，更不能换饭吃，在父亲的开导与劝说下，他终于还是勉为其难地点头了。好在军部的秘书，无非是起草一些千篇一律的公文，杜重石的国文底子深厚，手到擒来，并不吃力。何况杨森的秘书数量甚众，最多的时候，能编一个排，落到杜重石肩上的任务，也不是那么重的。

当时广安城内，办有一所广安中学。那是由地方士绅合资在

清代的紫金书院、民国初年的紫金小学基础上逐年发展建立起来的三年制初级中学。1933年，县教育局根据夏炯的提议、杨森的授意，在离城30里的戴市镇成立一所中学，包括小学在内，称为县立第一中学。经过近半年的观察，杨森见杜重石当个秘书游刃有余，当个教师更其屈才，就决定给他加码，要他兼任县立第一中学的校长。杜重石见杨森果然并不食言，高兴万分，兴致勃勃地到戴市镇上任去了。

那个年代的青少年能够上小学的称为“百人望”，能够上中学的称为“千人望”。由于家境的贫富不一，学生的入学有早有晚，有的人交不起学费，读两年，停两年，有的人小学毕业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再来上中学，都不是什么少见的事。因此同一个年级中，学生的年龄大都参差不齐，最小的还拖鼻涕，最大的可能已经做了父亲。1933年暑假，杜重石刚满20周岁，而学生当中，年龄比他这个校长大的，也大有人在。

戴市镇是广安县的第一大镇，在广安县境东北，距县城30里许，相对县城而言，地处渠江上游。杜重石既当二十军军部秘书，又当县立一中校长，就不免要“两头忙”。好在那时候他年轻力壮，生气勃勃，虽疲于奔命，也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从此，在小小的广安县，人人都知道有个少年得志的杜秘书、杜校长。

三、杨森和他的二十军

杨森的一生，在四川各军阀之间时分时合，时打时和，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他一心想在四川自立为王，顾忌到自己力量不足，又不得不投靠吴佩孚、蒋介石，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也是时而联合，时而反目。他是一个典型的多面派人物，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个人的历史，稍加敷衍，就是

一部十分生动有趣的演义小说。由于本书不以他为主角，所以不打算详细叙述他的故事。本书以杜重石先生为主角，以杜先生为中心贯穿全书，与杜先生有牵连的人和事，大都要涉及。杜先生大学毕业以后，就在杨森的二十军做事，终其一生，受杨森的影响很深，本书的后面，也有许多地方要提到杨森及其二十军，完全撇开杨森一字不提，既做不到，也不应该。因此，这里特辟一节，浮光掠影地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四川军阀。

杨森，原名淑泽，字伯坚，号子惠，生于 1884 年 2 月 20 日（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四）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老二淑身，字懋修，曾在川军唐廷牧师任旅长；老三淑实，字传三，在杨森的二十军第九师当军需主任；两个妹妹，都嫁给了二十军的军官。

杨森的父亲是个学武的生员。也许他自己练武一生，始终没当上个将军，有些灰心了，所以他不让杨森习武，而送他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和四书、五经，后来又上了广安县的紫金小学和顺庆府（今南充）中学。

但是杨森见堂兄弟们都在练武，他自己也很喜欢骑射，就偷偷儿跟着堂兄弟们学。所以杨森勉强可以说是个“文武全才”。这和他一生喜爱体育，也不无关系。

中学毕业以后，杨森考取了清廷设在成都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并在这里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0 年，杨森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被派在成都附近的新军当排长。辛亥革命中，杨森追随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尹昌衡围攻督署，擒杀总督赵尔津，升任营长。

1915 年 1 月，杨森任云南讲武堂队长，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滇军军官，为他以后在滇军中得势打下了基础。

1916 年反袁护法之役，杨森任护法军第一军军部参谋。这期间与朱德同事，两人结下了较深的友谊。

1917年8月，杨森任靖国军第二军参谋长、靖国军总部参谋长。

1918年初，杨森任泸州靖国清乡司令兼独立团团长，支持并参与恽代英、肖楚女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杨森转投川军，任熊克武部旅长。

1921年，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杨森任第九师师长兼川南道尹，一方面任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支持恽代英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中勾结。

1922年5月，刘湘兵败，辞去川军总司令，杨森任第二军军长，从此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开始与第一军在万县、重庆、成都之间展开拉锯式内战。这期间，杨森曾邀请朱德到他的第二军任职。朱德因不满国内的军阀混战局面，一心出国寻求真理，谢绝了杨森的邀请。朱德出国之前，杨森为他设宴饯行，并说“虚位以待”，随时等朱德回来与他合作。

1924年5月，吴佩孚操纵的北洋政府任命杨森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相当于督军）兼理政务，大批网罗文人学士，成立“智囊团”，提出“建设新四川”的口号，禁止缠足、赌博，提倡运动和卫生，推行新政；并办起了“四川陆军讲武堂”，为自己的军队培养亲信骨干。

1925年，吴佩孚政权垮台，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为削弱杨森的权力，任命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所有川康军队；任命赖心辉为四川省省长、刘文辉为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使四川军阀互相牵制，扩大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杨森企图以武力统一四川，结果众叛亲离，反而被刘湘、袁祖铭的“川黔联军”逐出夔门，军队大部被刘湘所收编。杨森逃到汉口，吴佩孚打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旗号，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委任杨森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收拾旧部，打回四川。这时候刘湘和袁祖铭发生了矛盾，都派人来与杨森联系。杨森两面都接待，实际

上他联合刘湘，共同驱逐黔军袁祖铭。

1926年，杨森联合刘湘，把黔军头目袁祖铭赶出四川，将所部改编为十个师，分别驻扎大竹、梁山、涪陵、开县、长寿、夔府（今奉节）、丰都等县，占据以万县为中心的“下川东”地盘。

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进逼吴佩孚盘踞的武汉。杨森见北伐军势力强大，派代表到广州要求“易帜”——因为杨森原来打的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北伐军打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北伐军总部考虑到杨森的势力及与吴佩孚的关系，派杨森的老朋友朱德带领一批政工干部到了万县。不久，陈毅也奉命从北京来到万县，协助朱德工作。杨森迫于形势，虽然不得不表示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但暗地里仍与吴佩孚有往来。8月21日，还接受吴佩孚给他的“四川省省长”的封号。

8月29日，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号”客轮撞沉杨森军押送银元的两只木船和一只筏子，淹死官兵58人、民工十多人，损失枪支五六十支、银元8万多元。朱德、陈毅得到这一消息，极力鼓动杨森向英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8月30日扣留了“万流号”客轮。9月4日，陈毅与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万县被英轮肇祸惨毙同胞雪耻会”，发表宣言，并召开“万县各界群众抗英大会”。9月5日，驻宜昌英海军陆战队63人，企图将“万流号”劫走，与中国士兵发生枪战。停泊在万县江边的英海军军舰“柯克夫号”和“威警号”即向万县市区开炮，并发射燃烧弹，炸毁、烧毁民房400多间，死亡居民604人，负伤389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

“万县惨案”发生后，朱德、陈毅等人联合万县地下党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英大会，发表宣言，提出赔偿要求，全国各地人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杨森也做好了与英军开战的准备。形势的发展，使英帝国主义者惊慌失措，不得不派出重庆、宜昌两地的领事出面调停。

这期间，朱德去武汉联络杨森“易帜”的事宜。10月25日，北伐军总部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委任朱德为党代表。在杨森之后，四川军阀也纷纷“易帜”。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二十九军军长。

1927年1月，英方见中方态度强硬，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出于自己的利益，密电杨森“和平解决”，暗地里让英方给杨森一些赔偿。杨森不敢违背吴佩孚的旨意，释放了被扣英轮“万县惨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3月，吴佩孚秘密派人来与杨森策划暗杀朱德的事。杨森当然也知道朱德已经是共产党人，生怕自己的部队被朱德所赤化，不能长期留朱德在自己的部队里。但他仍以“友谊为重”，对朱德采取“不杀政策”，而是抬出10万大洋来，请朱德带领原班政工人员以到武汉参观学习为名，“礼送”出境。朱德也从侧面了解到吴佩孚的活动，知道自己继续留在万县非常危险，就离开了二十军。后来蒋介石另派一个姓刘的人到二十军任党代表。朱德走了以后，杨森把二十军中有革命倾向的官兵23人统统枪毙，连他自己的侄儿、第九师师长杨汉域也被关押起来，后来调任军部副官长，剥夺了军权。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不但要与武汉国民政府唱对台戏，还出兵攻打武汉国民政府。他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电令杨森率部出川，进攻驻扎在鄂西的武汉政府主要武装力量唐生智部。

5月5日，杨森部自万县东下，9日进驻宜昌，14日进驻荆州，21日进驻仙桃镇（今仙桃市），直指汉阳。6月8日，唐生智集中兵力反击，包围仙桃镇。杨森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处处挨打，6月20日，终于全线崩溃，逃回宜昌，部队伤亡惨重，第九师几

乎全军覆没。

刘湘见杨森仙桃镇大败，趁机进驻万县，并打算封锁夔门，不让杨森败军入川。刘文辉、田颂尧等见刘湘后路空虚，又打算趁机进攻重庆。刘湘不得已回师保老窝，杨森方得于 6 月 26 日返回万县。——从此刘湘与杨森旧债未清，又加新账，冤仇越结越深。

1927 年 7 月，吴佩孚走投无路，逃到四川。一入夔门，杨森即亲自到奉节，迎接吴佩孚进入白帝城。此后的几个月，他不顾全国各地声讨吴佩孚及国民政府的通缉吴佩孚令，又把吴佩孚接到万县。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8 年 1 月 1 日明令免去杨森本兼各职，委任杨的师长郭汝栋接替二十军军长。从此又引发了杨森与郭汝栋之间长达十来个月的争权混战，最后不但大获全胜，还于 1928 年 10 月 6 日迫使蒋介石对杨森发出“免予查办”的明令。

杨森恢复二十军军长职务以后，心心念念，只想找刘湘报昔日之仇。1928 年 12 月 16 日，杨森发出讨伐刘湘的通电，22 日拂晓开始进攻。但是连战皆败，先出击的杨汉域师全师被缴械，长寿失守；1929 年 1 月 3 日，全军败退梁山，继而败退达县，绕道宣汉，退守渠县。杨森倒刘湘彻底失败，最后只剩下残缺不全的 6 个混成旅，下川东一带 20 多个县的地盘，统统被刘湘占去，不得不寄人篱下，惨淡经营。

从 1929 年到 1933 年，杨森以渠县为基础，逐渐扩展自己的势力，又恢复了拥有七八个县的实力。这时候他的虚衔儿计有四川省政府委员、川康绥靖第三路总指挥、四川剿匪第四路总指挥等好几个；但是他真正的“实职”，是二十军军长，真正听命于他的，也只有二十军。

杜重石就是在杨森惨败之后刚刚有些抬头的时候，来到二十军的。